

LÜXING YU TANXIAN JINGDIAN WENKU




—SITANBEIKE ELUOSI JIXING—

# 斯坦贝克 俄罗斯纪行

【美】约翰·斯坦贝克 著    罗伯特·卡帕 摄影    杜默 译



重庆出版社 

JIXING YU

探险经典之作

SITANBEIKE ELUOSI JIXING

# 斯坦贝克 俄罗斯纪行

[美] 约翰·斯坦贝克 著 罗伯特·卡帕 摄影 杜默译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斯坦贝克俄罗斯纪行 / (美) 斯坦贝克著; 杜默译.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6.1

(旅行与探险经典文库)

ISBN 7-5366-7383-3

I. 斯... II. ①斯... ②杜... III. 游记 - 作品集 - 美国 - 现代

IV. I7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46356 号

---

A RUSSIAN JOURNAL by John Steinbeck

Copyright: © John Steinbeck, 1948

Copyright renewed Elaine Steinbeck, Thom Steinbeck, and John Steinbeck IV, 1976

Introduction copyright © Susan Shillinglaw, 1999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McIntosh and Otis, Inc.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5 by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版贸核渝字 (2005) 第 90 号

---

斯坦贝克俄罗斯纪行

A Russian Journal

[美] 约翰·斯坦贝克 著 罗伯特·卡帕 摄影

杜 墨 译

---

责任编辑 周英斌 苏少波 (特约)

封面设计 鱼羽图文设计

技术设计 汉诺图文设计

---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市长江二路 205 号 发行电话: 023-68814956)

金坛市教学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 880 × 1240 1/32

印张 8.5 字数 212 千

版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

ISBN 7-5366-7383-3/I · 1387

定价: 25.00 元

# 【序言】

## 行万里天涯路 念天地之悠悠

——《旅行与探险经典文库》序

葛剑雄

好奇是人类的天性，求生是人类的本能。原始时代的人类生产能力极其有限，生存能力低下，只能经常性地、无目的地迁徙。在此过程中，应该有大量自觉与不自觉的探险经历。可惜年代久远，当时又没有文字记载，所以即使是世界上一些文明古国或拥有辉煌古代文明的民族，也没有留下早期的探险记录。

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称黄帝“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黄帝的踪迹东至山东半岛，西至今甘肃，北至今内蒙古，南至湘江流域。如果将此记载看成一个以黄帝或其部落为首领的部落联盟的活动的活的话，其中应该有不少探险事迹，只是当事人未必有自觉的意识，或者虽有而未留下记载。

不过从《山海经》的内容可以看出，古人并非没有探险，也不是完全没有记录。学者对《山海经》的成书年代的看法分歧很

大，但最迟不会晚于西汉，其中包含的原始资料则可以追溯到很早的时代。一般认为，《山海经》所记述的地理空间基本不超出今国界，但涉及的范围却相当广阔，自然包括了不少境外的奇闻趣事，其中总该有得于记录者直接的经历。从这一意义上说，《山海经》是中国早期探险记录的汇编。如果认为《山海经》的内容过于荒渺，那么在内地，甚至沿海发现的和田玉则是实实在在的存在，说明早在新石器时代，已经有人将产于昆仑山的玉石运到数千公里之外，其中肯定有不少探险故事。

《穆天子传》尽管未必是周穆王的经历或当时的记载，但至少反映了先秦时代中原人对西方的向往。而其中记录的内容，也或多或少显示了当时人的地理知识和丰富想像。昆仑山、西王母被神化，固然与人们的愿望有关，但不能完全脱离现实的基础，说明当时的人还习惯于向外界寻求精神和物质财富。生活在战国后期的屈原，尽管游踪有限，但从他的作品中却不难看出他的探险精神。

在公元前221年完成一统大业的秦始皇，虽然正式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皇帝体制，却是皇帝中为数不多的旅游和探险爱好者，对自己统治范围以外的地方也有浓厚的兴趣。在灭六国后，他几乎没有停止过全国性的巡游，最终死在途中。在他的鼓励和支持下，一批方士扬帆远航，虽然他们始终没有为秦始皇找到不死药和神仙，却由徐福完成了一次至少有数千人的大规模移民。

汉武帝时代的开疆拓土一度激活华夏诸族的外向意识，被誉为中国第一探险家的张骞，正是奉武帝的政治使命，尝试联络已迁至中亚的月氏夹击匈奴，才意外取得“凿空”——通西域的伟大成果，将中原人的足迹远推到大宛、乌孙、大月氏、大夏、康居、安息、身毒等地（今新疆和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伊朗、印度、巴基斯坦等国），所了解的地理知识范围更大。而武帝本人也步秦始皇后尘，在国内广泛巡游，并且特别钟情于边境和海滨，显示了他对外界的强烈向往。

但秦始皇、汉武帝式的帝王从此成为千古绝响，随着中央帝

国的巩固和疆域的扩展，由皇帝到臣民，对境外的兴趣越来越淡薄。从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等各方面因素考察，这种现象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从汉朝至清朝中期，中国都是亚洲乃至世界最强大、疆域最辽阔的国家。特别是在东亚汉字文化圈内，朝鲜、越南等政权都是中国的藩属，日本也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直到明治维新时还无法望中国的项背。太平洋、青藏高原、横断山脉、欧亚大草原给中国提供了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直到16世纪西方的远洋船接近中国之前，还没有外来势力构成对中国的威胁。北方的游牧民族虽然曾不止一次成为军事上的征服者而入主中原，但最终无不成为文化上的被征服者。虽然中国的人口在12世纪突破1亿，17世纪突破2亿，19世纪突破4亿，但完全可由本国出产的粮食供养。除少数奢侈品外，中国的物产中心能满足全国的需要，对外贸没有依赖。所以当英国向乾隆皇帝提出在北京设立常驻贸易代表时，理所当然地被断然拒绝，除了体制上从无先例外，一个重要的依据是“天朝无所不有，无需仰赖外人”。儒家的“夷夏之辨”和“五服”学说，更加深了这样一种观念：天下再也没有比中国更文明富裕的地方，除了华夏诸族和中原王朝的疆域之外，其他都是蛮夷之邦和要荒之地。

长期处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国人自然失去了向外寻求财富和文明的动力，更不会想到要到境外去旅游或探险。就是在汉唐盛世，号称中国历史上最开放的时代，也只是敞开大门让境外的人进来，而不是同时允许甚至鼓励自己的臣民走出去。在外贸发达的唐宋时代，外贸商人也主要来自外国。当西方商人已经敲响中国的大门时，明朝的反应是“片板不许下海”的禁令，以致福建沿海的商人只能采取武装走私的手段而成为“海盗”，甚至雇佣日本武士形成“倭寇”。尽管600年前郑和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船队七次“下西洋”，远达西亚、东非，却连完整的档案都没有保存下来，更没有像哥伦布那样导致新大陆的“发现”。

与中国悠久的历史、强大的国力、众多的人口、发达的文化极

不相称的一个现象，是直到进入现代社会以前，中国始终没有出现过职业旅行家和探险家，现存的有关境外的记录都是非职业旅行家和探险家的副产品。例如，张騫、《中天竺国行记》作者王玄策、《真腊风土记》作者周达观、《西域行程记》作者陈诚，《异域录》作者图理琛是外交官，《佛国记》（《法显传》）作者法显、宋云，《大唐西域记》作者玄奘是往西域取经的虔诚佛教徒，《经行记》的作者杜环是怛罗斯之战的俘虏，《长春真人西游记》的作者李志常是奉召谒见成吉思汗的道士丘处机的随员。他们的记载往往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或惟一的，如《大唐西域记》中有关今阿富汗境内巴米扬大佛的描述，不仅证实了大佛建造于公元7世纪，而且还给今人提供了附近另有一尊卧佛的重要信息。要是没有《真腊风土记》对吴哥城的记载，这座古城也许会继续掩埋在热带丛林中。这些记载的产生和保存也有偶然性，如玄奘返国后就要翻译佛经，要不是唐太宗专门下令，就不会撰写《大唐西域记》。《岛夷志略》作者汪大渊或许是例外，他是因“好游”才多次出国的，不过他有幸搭乘外国商船，否则就只能梦游或卧游了。

真正的异数是徐霞客，他是惟一称得上职业旅行家和探险家的人物，并且留下了具有非常高的地理学成就的著作《徐霞客游记》。但他的成就得益于一系列特殊因素：科场失意使他不得不绝意功名，富裕的家境使他能有充足的旅费，能干的母亲使他无家累之忧，社会对知识分子的优待使他能在旅途享受不少公费或私人接待，友人中的名流使他的著作能在身后流传，现代地学家丁文江的发现和表彰使他的地理学成就得到肯定和发扬。只要缺少一点，或许就没有今天大家了解的徐霞客了。不过徐霞客的足迹没有超出当时两京十三布政使司的范围，连西藏也没有到，更不可能出国探险，这也是历史的局限所致。

这并不是说中国古代不具备实施探险的能力。至元十七年（1280），元世祖忽必烈想查清黄河的源头，在那里建一座供吐蕃商人与内地贸易的城市，并设立转运站，下令都实与阔阔出两人率

队考察。他们于当年4月从河州（今甘肃临夏市东北）启程，四个月后到达河源，冬天返回。此后潘昂霄根据阔阔出的口述写成《河源记》，将黄河的正源确定在星宿海西南百余里处，对黄河最上游的水文、地形、地貌和人文景观的记录已相当具体准确。乾隆四十七年（1781），阿弥达受命探寻河源，以便就地祭祀河神。这次的探险将黄河正源定在星宿海西南的阿勒坦郭勒，即卡日曲，与1978年青海省政府组织的考察结果完全一致。这证明中国长期缺乏探险传统、中国人不能去境外探险的根本原因，还是缺乏现实的需要。

反观世界上一些航海、探险发达的国家，探险的范围广、产生探险家多的民族，无不有其深远的传统和迫切的需要。例如，古代地中海沿岸国家无不以对外贸易为致富手段，以对外殖民和扩张为立国之本，其前提是这些国家的本土一般幅员不广、资源匮乏、耕地有限，甚至连水源都不足。而穿越地中海的航行并不困难，海外的土地、资源和人口自然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以后，阿拉伯、西欧、北欧一些国家致力于航海和外贸，大批航海家、探险家不顾艰险寻找环球航路，发现新大陆，也无一不是出于国内的生存压力和扩张需求，无不以夺取土地、奴隶、黄金、木材、矿产、市场、要塞、殖民地为目的。连早期的南极考察也是如此，甚至是为了猎杀企鹅获取制皂的油脂，出售海豹的皮肉牟利。但正是这样卑鄙邪恶的目的，促成了新大陆和南极的真正“发现”，造就了不少杰出的航海家和探险家，也在一些国家和民族中形成了探险的传统。在这样的条件下，职业探险家，包括一些纯粹出于人文和科学目的的真正的探险家应运而生，有的不惜为之献身，成为人类的骄傲，他们的记录和著作成为人类共同的财富。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都不可能所有方面都拥有优势或长处，也不可能始终先进，所以都必须向其他国家或民族学习。应该承认，直到今天，中国的探险事业还比较落后，中国人在世界范围的探险还很有限。2000年我参加中国第十七次南极考察队去长城站期间，就受到很大的震动。当然，中国人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



走向世界，在地球的两极、全球所有的高峰、五大洲、七大洋都已留下了当代中国人的足迹，在中国出现世界一流的探险家指日可待。但历史无法重复，了解人类以往的探险经历和经验不可或缺。而且由于自然和人文环境的变迁，以往探险家记录的现象有的已永久消失，只能从他们的书中领略了。

重庆出版社新近推出的《旅行与探险经典文库》，其着眼点显然正在于此。该文库融探险、考古、文学、文化人类学于一体，既勾勒探险家们多姿多彩的极限生涯，也凸现积极向上的个人英雄主义，更重绘人类文明不为人所知的曲折发展图景。该文库预计推出三辑，首辑推出的十本新书中，有20世纪最为激动人心的探险经典海尔达尔的《孤筏重洋》、《太阳号草船远征记》、《复活节岛的秘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斯坦贝克冷战时期的涉险名作《俄罗斯纪行》，有勘探成吉思汗古老帝国秘密的冒险旅行《寻找成吉思汗——骑马横越蒙古大草原》，有复原名著《白鲸记》惊险氛围的《寻找白鲸记》，有追溯著名探险家维迪亚生平足迹的《维迪亚爵士的影子》等等。稍后即将推出的二、三辑，预计会在继续关注名家名著的基础上，更注重地域性、民族性以及探险方式的独特性，在提炼个人探险经验的前提下，将世界各地文化的丰富多彩与人类生存方式的多种多样，更真切全面地描绘出来。

这些探险作品涉及范围之广泛，记载内容之丰富，情节之生动惊险，描述之细致传神，只有读过的人才有体会。无论是为了科学研究，积累知识，还是为了陶冶性情，欣赏休闲，都会开卷有益。与一般读者相比，我的游踪或许较广，但我自知对这套书中涉及的地方，大多是这辈子都到不了的。2001年从南极返回途经智利时曾想去复活节岛，因多种原因未去成，不知今后是否再有机会。好在第一辑中就有《复活节岛的秘密》一书，多少能够弥补我的遗憾。

2005年6月5日

## 【导 读】

### 导 读

苏珊·席林格罗

1946年，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宣称东欧各地已垂下“铁幕”。1947年冬天，冷战如火如荼地展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坚定盟友苏联，业已变成危险的存在，成为一个罕为世人理解的敌人。斯坦贝克在本书中开宗明义就说：“报纸上，有关俄罗斯的消息每天不下数千言”，但他也接着说道，“有些事一直没人写，而我最感兴趣的就是这些事”。他和同行的摄影家卡帕的探索，行将发现“伟大的另一面”、“俄罗斯民众的私生活”。1948年所出版的俄罗斯人生活记录《俄罗斯纪行》，只是“如实记录、写下所见所闻，不加评论，不对我们不充分了解的事妄下结论”，堪称是斯坦贝克和卡帕最质朴的作品。

从很多方面来看，写市井小民如乡野村夫、俄克拉何马移民、二战军人、墨西哥农民，正是斯坦贝克二十年间表现相当出色的一环。《俄罗斯纪行》诚然没有《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史诗般的情怀，但仍具有该书的同情和人道特质。的确，《俄罗斯纪行》的

过人之处即是，这本书跟当时出版的俄罗斯纪事大不相同，注入和充溢斯坦贝克最独特的作风：对劳动群众表达同情和理解；以记者手眼捕捉翔实细节；“非目的论”地只记录眼见事实；最后赋予讽喻幽默，则是当代许多到过苏联批准地点的沉甸甸游记所没有的。斯坦贝克和卡帕这本书只是他们自称的“不是俄罗斯故事，而是一则单纯的俄罗斯纪事”，称不上是最博学多闻或包罗最广的战后俄罗斯专书。

其实，卡帕和斯坦贝克合作纯属机缘巧合。两人在1943年初会于伦敦，1947年3月在纽约重续前缘，准备尽快前往俄罗斯，不意5月14日这一天斯坦贝克狠狠地从住家窗口跌下，摔伤膝盖，花了好几星期休养（不过，膝伤仍为俄罗斯之行带来许多麻烦）。卡帕和斯坦贝克独立不羁，两人其实都不是对合作探险特别在意。早在1936年时，作家约翰·奥哈拉<sup>①</sup>过访太平洋丛林市（Pacific Grove），急于一晤斯坦贝克，并与他合作将新近出版的《相持》（*In Dubious Battle*）改编搬上舞台，当时斯坦贝克就曾表示：“我很喜欢他和他的态度……我认为我们可以相处甚欢……我不相信合作。”话虽如此，合作却是水到渠成，斯坦贝克发起或投入的联合计划不一而足，有些卓然有成，如1940年和海洋生物学家爱德华·李克茨（Edward Ricketts）前往柯提兹海〔（1941年出版《柯提兹海》（*Sea of Cortez*）〕，有些则是无疾而终，如与奥哈拉之间的合作即是。斯坦贝克尤其心仪视觉艺术家、电影制片和摄影家。著名战地摄影记者卡帕和他携手，堪称他与别的媒体艺术家合作最称心愉快的一次。

把人类的苦难与生机凝结成一帧帧著名战争照片的卡帕，1913年出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有着斯坦贝克般的悲天悯人和求知欲，也具

---

① 约翰·奥哈拉（John O'Hara）：美国名记者、小说家，1905~1970，《苏马拉约会》为其成名作。

有斯坦贝克的蓬勃生气、宽容和人道精神特质。诚如立传者李察·惠伦 (Richard Whelan) 所指出的, 卡帕形成于叛逆少年时的政治哲学与斯坦贝克相若: “民主、平等、和平、半集体主义、亲劳工、反权威和反法西斯, 极为重视人性尊严和个人权利”。卡帕在 1931 年被迫离开布达佩斯<sup>①</sup>之后, 半生流亡, 浪迹天涯, 见证大小战祸, 偶尔为《时代》、《生活》和《财富》杂志拍照, 始终是在非常之中偏重于平凡事。惠伦说, 卡帕拍人物不拍事件, 相机对准的是“事件的边缘……探讨极端压迫下的人”。

这两位名家 1947 年四十天苏联之行, 与斯坦贝克 1940 年和李克茨的柯提兹海之行一样, 都是一次求知探险。与前一次李克茨和斯坦贝克之旅一样, 卡帕跟斯坦贝克此行也是“要一见我们两眼所能适应的一切, 深思玩味, 从见闻思考中建立典型模仿的被观察实体结构”。如果说《柯提兹海》融“传统科学”与经验法于一炉, 本游记所选择的叙述法则则是单一镜头: “我们会尽量如实记录, 写下所见所闻, 不加评论, 不对我们不充分了解的事妄下结论。”这是一本纪行和摄影小品。他们为本书所选的结构, 亦即《俄罗斯纪行》的主要隐喻, 就是把苏联当成一幅裱框的画像。

## I

1940 年代伊始, 世局大变。“世事险恶,” 斯坦贝克 1940 年写给巴斯卡·柯维奇 (Pascal Covici) 主编的信中说道, “世事鼎沸, 昔日

---

① 卡帕在中学时就对政治极感兴趣, 曾有意加入共产党, 在一次入党的秘密会议中, 到最后一刻突然将入党申请书撤回, 不意第二天就被政府当局盯上, 家人也跟着受到盘问, 迫使他不得不立即出国, 前往德国求学, 从此挥别故乡与亲人, 这一年他只有十八岁。

所认知的每一件事，似乎都走向毁灭。在征战和斗争之余会出现新观念也未可知。”1940年代的斯坦贝克，致力于为自己的作品找寻“新观念”；这十年间，他从编纂科学旅游见闻录着手，而以最具个人色彩和最具实验性的《伊甸园东》(*East of Eden*)为结局。正如他在1946年黑暗期日记中所写的，《俄罗斯纪行》是他发掘新素材、建构新文学形式、重燃“那使别的事相形失色、让我现在变得宛如斑白动物般的荣耀……我不弹此调已久——太久了”。

1930年代末叶，斯坦贝克写作《愤怒的葡萄》杰作时就已发现这一荣耀。在此之前的十年间，他精益求精，出版一系列日后最常与“社会史家”斯坦贝克联系在一起的作品：《长谷》(*The Long Valley*)短篇小说集（写于1930年代初期，1938年结集出版），喜剧力作《制罐巷》(*Cannery Row*)及劳动三部曲《相持》(1936)、《人鼠之间》(*Of Mice and Men*, 1937)和《愤怒的葡萄》。套用1940年约翰·福特<sup>①</sup>电影《怒火之花》<sup>②</sup>广告词来说，到经济大萧条时期将尽时，“人民小说家”斯坦贝克已是“家喻户晓”。不过，对这位在致友人信函中多次强烈主张，必须隐姓埋名以便写作的作家而言，这种雅称不啻是沉重负担。1940年代的他洞见观瞻，全球莫不寄望于这位贫苦大众编年史家，再创激动人心的作品。批评家和书评家寄望于这位普罗作家回归1930年代主题，希望再听到振聋起聩之声。他不为所动。“我必须从

---

① 约翰·福特 (John Ford): 1895~1973, 美国电影导演。1913年到好莱坞, 当过替身演员、演员和助理导演。他善于在影片中描绘美国开拓史, 尤以《驿马车》(*Stage Coach*, 1935) 和《怒火之花》(*The Grapes of Wrath*, 1940, 本片获当年奥斯卡最佳导演与最佳女主角奖) 等片中的表现最为出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导演的影片有《亲爱的克莱门丁》(*My Darling Clementine*, 1946) 和《沉静的人》(*The Quiet Man*, 1952), 后者使他第四次获得奥斯卡奖。

② 《怒火之花》是由《愤怒的葡萄》改编而成。

头开始，”他在1939年写给大学同学卡尔顿·雪菲尔德（Carlton Sheffield）的信中说道，“我已尽其可能……从事小说创作。它充其量只是笨拙的工具，我从未多想。我虽不知道是否有新形式，但我知道新思维必是会塑造适宜的新事物。”他向雪菲尔德说道，在新的十年伊始之际，他初步采取的路线是科学和生态等“较恒久的事物”。1940年3月，他和友人、生物学家与莫逆至交李克茨启程考察柯提兹海沿岸，小说家斯坦贝克由此自我转型为海洋生物学家，1941年出版的《柯提兹海》游记，是斯坦贝克的杰作之一，虽受世人忽略，却是兼具科学观察和哲学沉思，并佐以李克茨记录沿途中发现标本的趣闻轶事的佳作。

作为游记、合作计划和结构实验的《柯提兹海》，是动荡的1940年代斯坦贝克作品的典范，而以40年代结束时出版的《俄罗斯纪行》为压卷之作。“他好比是进入大世界。”阿瑟·米勒<sup>①</sup>说道。追寻灵感激起他狂热十年大实验，他写电影脚本、新闻、旅游日志、剧本、短篇小说。的确，旅游几已成为1940年代斯坦贝克的万灵丹。他宣称“那儿有我需要的非逻辑”，并为此数度前往墨西哥，1941年，他应纪录片制片人贺伯·克莱恩（Herbert Kline）之请，写下有关墨西哥偏僻乡村卫生问题的脚本《被遗忘的乡村》（*The Forgotten Village*），战后重做冯妇，接着投入《沧海泪珠》（*The Pearl*）电影，1948年为导

---

① 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美国剧作家，1915~2005。在密歇根大学就学时开始写剧本，以《全是我儿子》（*All My Sons*, 1947）确立其剧作家地位。以《推销员之死》（*Death of a Salesman*, 1949年获普利策奖）而驰名世界。其他重要作品有《炼狱》（*The Crucible*, 1953）、《桥头眺望》（*A View from the Bridge*, 1949）和《拖延》（*Playing for*, 1981）。1956年与玛丽莲·梦露结婚（1961年离婚），又因被控同情共产主义，被非美活动委员会传讯，因而声名大噪。其自传《时光枢纽》（*Timebends*）于1987年问世。

演伊力·卡山<sup>①</sup>大制作《萨巴达传》(Viva Zapata)再度前往墨西哥。

斯坦贝克对美国参战的贡献，也打破他1930年代的画地为牢，使他离开加州故乡，先是在1941年前往华盛顿特区，任职刚成立的新闻与宣传机构“对外新闻处”(Foreign Information Agency)，接着转往纽约市，与日后成为他第二任妻子的葛雯·康格(Gwyn Conger)同居，并写下第一部战争作品《月亮下去了》(*The Moon is Down*, 1942年)，这本以一个被占领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为主题的小说，在欧洲地下反纳粹组织间颇获好评。这本小说及随后立即改编的剧本与电影，在美国的反响并不是那么热烈，因为美国并没把入侵者，尤其是德国人，视为人类。斯坦贝克失望之余，继续投入其他战争题材的相关计划：1942年初为“对外新闻处”撰写广播脚本，后来又应邀撰写空军轰炸人员训练教材，并与摄影家约翰·史沃普(John Swope)走访全美各地训练营区。

他在写给大学友人韦伯斯特·史萃特(Webster Street)的信中说道，回到东岸后孜孜于撰写《投弹了：轰炸机小组的故事》(*Bombs Away, The Story of a Bomber Team*)，“我离旧现实越来越远，越来越投入这梦幻似的战争，以备他日战争结束后可以省忆。”其他与战争相关的写作计划如后：与总角之交杰克·瓦格纳(Jack Wagner)写下电影

---

① 伊力·卡山(Elia Kazan)：1909~2003，美国戏剧和电影导演。1964生于土耳其君士坦丁堡，原名卡赞若格卢斯(Elia Kazanjoglous)。1913年随家人迁居美国，就学于威廉斯学院和耶鲁大学。在成为戏剧导演前演过一些配角。他因导演阿瑟·米勒和田纳西·威廉斯的剧作及与他人共同创办演员摄影棚(Actor's Studio, 1947)而闻名。1944年开始导演电影，因影片《君子协定》(*Gentlemen's Agreement*, 1948)和《岸上风云》(*On the Waterfront*, 1947)两次获奥斯卡奖。他的小说包括自传式的《美国啊，美国！》(*America, America*, 1962, 1964年拍成电影)。

《边城壮士》(Medal for Benny)的“脚本稿样”，谈一个小城迎接战争英雄的故事；1943年初，他为希区柯克名片《怒海孤舟》(Lifeboat, 或译《救生艇》、《战地惊魂》)写的剧本小说，写的是误触鱼雷幸存者怒海求生。最后，在1943年中，他获得一份最能发挥才情的差事：这年夏天，他以《纽约先驱论坛报》(New York Herald Tribune)战地特派员身份被派赴海外，足迹遍及英格兰、西非，最后到意大利沿岸报道军事牵制任务。

从很多方面来看，《俄罗斯纪行》都可说是这些战地报道的最后篇章。斯坦贝克写道，斯大林格勒(Stalingrad)是“一片废墟，从我们窗口望出去，触目尽是残垣断瓦和破碎的石膏，而在残破之中，却见那总似长在破落地方的奇异黑草”。在这场景之中，“有个宛如地鼠洞口般的小丘，每天一大早有个小女孩从洞里爬出来”。斯坦贝克从这迷惘惊惧的孩童周遭的黯淡光景中，看见被围城后的斯大林格勒的苦楚。一窗如镜，在这框架里的语言结构与照片相辅相成。诚然，《俄罗斯纪行》最明显的特征之一即是，斯坦贝克文字报道与卡帕的新闻摄影交融的方式。斯坦贝克显然用的是纯写真的手法，仿佛这趟与摄影家合作的计划被指定了写作风格与方法。正如他在《俄罗斯纪行》第一章再三指出的，作家和摄影家决意只记录眼见的事实，不做他想。1947年的苏联，观光客行动受限，很少能看到斯大林治下的领域，而照片正是极合适的参观访问意象。

## II

“约翰(斯坦贝克)其实是个传教士。他基本上是个记者……我觉得，他可以看到事态真相……我的意思是说，他是观察入微的记者。”

——托比·史萃特(Toby Street)



就斯坦贝克而言，1943年当起文字记者不算新奇。1930年代末叶，这位从前无心于政治的作家，在传教热情无从宣泄之余，便放眼当时的加州场景。《相持》和《人鼠之间》表现的写实主义具有新闻批判的特征；《愤怒的葡萄》背后的动力则更具纪实色彩。1936年8月，文学报《旧金山新闻》(*San Francisco News*)派斯坦贝克撰写加州移民连载文章。这七篇文章结集成《农工吉卜赛》(*Harvest Gypsies*)，作者化为文学见证人，通过忠于事实的手法传达移民悲情，堪称斯坦贝克第一新闻写实成就。他以热烈的散文笔法刻画移民家庭的困顿：“……在这对夫妇脸上，逐渐现出一种每个人都有的神情，不是担心，而是对弥漫营地周边的饥馑的绝对恐惧。”他形容移民所坚持的体面是：“屋舍约十英尺见方，完全由瓦楞纸搭成……新雨初降，细心搭起的屋舍倾圮，变成一堆棕褐色的烂簞……”斯坦贝克所见证的社会动荡，着眼于边缘人承受的苦难和维系的尊严。

七年后，斯坦贝克奉命报道二次大战时，仍一秉同样的热情和犀利目光，着眼于为人忽略的枝节：军舰上头戴战盔的人看起来“像是一排排的蕈菇罗列”；轰炸机员穿戴战斗装，“加上一层层装备，人越来越大，走起路来煞是僵硬，宛如人造人一般”；鸽派人士对德国的军力和强势“无可救药地毫不动容”。斯坦贝克在一段最具代表性的章节中，写到伦敦围城的光景：

告诉你伦敦遭闪电攻击情况的人，一开口就是火光和爆炸，然后几乎千篇一律以一个悄然而至、定格、成为整个事件象征的小细节结束……“那玻璃，”有位男子说道，“早上清扫碎玻璃的声音，琤琤琮琮，单调又险恶。”……有位老妇人叫卖寒伧得可怜的熏衣草芳香喷剂。炮声震天，撼动全城，屋舍建筑失火，火光熊熊宛若白昼。炮声隆隆之中，小洞里传出她的声音——刺耳的声音。“熏衣草！”她说道，“买